

反思过去着眼未来——谈近年北大图书馆拓片资源的建设

胡海帆（北大图书馆金石组）

由于历史原因，身为国内金石文献收藏大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自1957年以后，近40年间未曾补充拓片新资料，其结果对学校教学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对馆藏建设而言，失去了大量难以挽回的收集机会。近年来我馆反思这一问题并努力弥补之，在整理旧藏、实施拓片数字化的同时，恢复资源建设，购藏新拓片，数年下来取得了可喜成果。本文仅就此作一点介绍。

一. 历史状况回顾

北京大学因文科系所教学研究之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设立国学门之始，即开始大规模收集拓片。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成绩斐然，包括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旧藏在内的大批金石拓片归于北大名下。195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收集到的拓片已达30666号（每号有1至数份），就当时一个学术机构而论，此规模恐为海内外之首。随着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大文研所的拓片全部移交北大图书馆，加上新并入的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德学会等处藏拓及本馆多年积累，1957年北大图书馆收藏的金石拓片达6万余份，在国内外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

丰富的拓片收藏为北大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文献保障。北大学者一些著名的学术成果，如陈垣《道家金石略》、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的编纂，都与北大金石收藏密不可分。

1957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北大的学术氛围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所冲淡，收集、利用金石文献受到干扰，图书馆拓片收集乃至拓片整理编目都陷入长期停顿。这种状况并非孤立的，从全国范围看，许多图书馆都有类似的情形。若探究缘由，客观的说，历史大环境的影响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也不乏人为的因素，各单位有关领导和部门对金石拓片收集工作重视程度以及由此所采取的相关措施直接影响到事情发展的走向。与上述做法形成对照的是，国内也有些图书馆，决策者具有远见卓识，重视古文献的收集，长期稳定地访求拓片文献，馆藏稳步增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即是这方面的表率。

二. 吸取历史教训

收藏工作长期停滞，致使曾有很好基础的北大藏拓出现了断档，由此失误产生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现。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批新出土、新发现金石中蕴含的新史料，没能得到及时应有的补充；其次，这40年是一段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因种种原因，碑刻大量毁坏亡佚，收集机会已错过，甚至不复存在。

金石铭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社会信息，其文献价值之高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金石的自身特点，还决定了在古籍等纸本文献数量已大致稳定时，新的金石文献却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建设增多，不断有新的金石出土或被发现，其数量相当可观。比如，陕西编纂出版《全唐文补遗》已经披露了金石文献5千余种，多系《全唐文》成书之后新发现的唐代碑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收墓志5千余种，基本上是民国以来出土的；《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收墓志1464方；陆续推出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陕西卷）、（重庆卷）……等，都收录了大量解放后新出土的墓志。

在对古代社会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学界对金石文献证史补阙的作用日益重视，不断发掘利用其内容，这就要求文献收藏机构能尽可能多地收集拓片。北大图书馆作为高校乃至全国的古文献收藏基地，肩负着文献保障重任，自然责无旁贷。然而40年来未能及时补充金石新品种，特别是解放后大量出土的新史料，其负面影响是显然的。设想，如果北大图书馆拓片收集工作不间断，延续下来，而今增加的新品种可能数以

万计，丰富的新资料对学术事业的发展定会有促进作用。

虽然碑刻受到自然和人为的毁坏自古有之，但近代以来毁碑的速度大大加快。相当数量的碑刻未得到妥善保护，毁于城市改造、工程建设中。文革中破四旧，更使大量金石受到灭顶之灾。此外，空气、环境污染加剧，致使露天碑石自然风化也变得非常严重。以我们所处的北京地区为例，北京海淀恩济庄太监墓地，曾有全国最大的清代太监墓碑群，据1958年文物普查记载，当时曾有碑504座，经过“文革”的破坏损毁，1983年墓地仅存碑刻30余块。又如，1930年北平研究院曾遍拓北京内外城大小庙宇金石，得1200余种，50年代初北图再捶拓北京地区石刻，据粗略统计，二者比较，同一区域二十年中少了1/3的品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庙宇历尽磨难，大多已经无存或改作他用，碑刻能保留下来的数量更可想而知。况且有些碑刻虽然尚存，铭文却早已残泐，难以辨识了。

50年代以来大量碑刻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破坏，亡佚数量和毁灭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而我们却没能抓住机会去收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另外，从价格因素、购买难易的角度看，停止收集也错过大量入藏拓片的好时机。内行知道，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古旧拓片在厂肆书店曾是价格最低、最易购买的时期。而如今由于收藏热、文物保护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已导致拓本价格大幅攀升。

回顾过去，就是要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在延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弥补过失。

三. 收集工作重新开始

历史经验使我们意识到，恢复拓片收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又有紧迫性的工作，应持之以恒，实现制度化和科学化。北大图书馆金石组在1992年馆藏资源调查报告中，开始呼吁恢复收集拓片，并在本馆五四科学讨论会等场合提请图书馆关注此问题。这些努力得到了馆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1996年图书馆开始拨款，恢复购拓。此后拓片收集逐步形成了制度，成为金石组日常的业务工作。

根据北大图书馆收藏现状及经费情况，金石组确定了优先重点收集入藏的金石类别与品种。如：各类金石中，应重点收集史料、文献价值较大的石刻类、金文类拓片；石刻类中应重点收集人物传记类，如墓志、墓碑拓片和重要纪事类碑刻拓片；还有以下方面的拓片，如：稀见不易得到的金石，边疆偏远地区的金石，因基建工程影响或自然条件改变即将淹没毁坏的金石，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金石，古代早期的金石，以及馆藏特别薄弱、需要加强的金石类别等，均应优先重点收藏；鉴于本馆传世金石拓片收藏较全，所以解放后新出土新发现的金石拓片应重点收集。还有收集品是否完整、质量好坏，出土来源信息的全面、准确也是需要注意的。

目前我馆拓片收集，主要来自各地文物部门、文物商店、古旧书店、拍卖会和私人出售，也有捐赠，还有少量是本馆外出捶拓的。我们很想利用复本多的优势进行馆际交换，但限于目前的体制还难以办到，希望今后能实现。

北大图书馆拓片收集工作也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我馆收到过一些热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旅美华人杜毓淦先生捐献历代碑志拓本33种、山西武晋岗先生捐献《明东书堂帖》等、北大迟惠生夫妇捐献《吴天发神谶碑》拓本等。需特别提到的是，近年我馆购拓得到香港北山堂基金会的资助，收获良多。这是我们要衷心感谢的。

四. 近年拓片收集情况

自1996年恢复收集以来，截至2004年底，北大图书馆新增拓片3700余种、近4000份，年平均增加400余种。增加的结果，馆藏拓片总量在3万种7万份以上。

新增拓片以石刻为主；时代上自西汉，下迄民国，汉、唐和明清时期占绝大部分；从地域看遍及南北，主要来自陕西、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四川、山西，其中又以陕西、河南数量最多。下面将所得择要述之。

第一，碑志方面的收集

墓志、墓碑是研究古代人物的重要资料，是我馆收藏的重点，所以收集比较在意。新增墓志较多，共

得 1250 余种，从而使我馆墓志品种总量增至 5500 种以上。这是近年我馆拓片收集工作最大收获之一。所收墓志以河南出土北朝墓志、隋唐志、宋志和陕西明清志为主。多系解放后出土品种，也有不少我馆未收的传世旧拓，主要是金石家李根源、徐乃昌、吴元起等人旧藏，印记累累。胡介眉旧藏民国墓志初拓本 16 种也多为精品。

陕北绥德、米脂东汉墓室画像石拓片入藏数量为 516 张。有墓室题字者 14 种，时间集中在公元 90 年至 139 年期间。陕北汉画像石极富地域特色，不少内容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东汉边陲的社会生活，颇为难得。收集的结果，集解放后陕北出土汉画像石之大成，系统地反映了该地区东汉画像石的风格特点和现存状况。

入藏任城王墓刻石拓片也是收集汉刻的收获。1992 年文物部门对山东济宁东汉任城王刘尚墓进行挖掘修复。刘尚是汉光武帝刘秀之孙，为任城国始封王，其墓规格甚高，在题凑石墙上镌刻有 800 余处题记。题记为民间隶书，书法朴拙率真，系工匠、送石者所刻，包括籍贯、姓名等内容。对研究汉代社会、地理、丧葬制度、文字书法都有价值，被誉为汉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我馆收藏任城王墓刻石拓片 171 种，为上述题记中的精品，文字较多，精工椎拓。

2004 年购入北宋皇陵碑志全套拓片是我馆一项较大收获。河南巩义市境内的北宋皇陵，160 余年中，埋葬有宋太祖至哲宗七帝、二十二位皇后，还有上千座皇室陪葬墓。规模宏大，在中国古代陵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廿世纪 90 年代文物部门对北宋皇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察和部分发掘，还对地面遗存、地下出土的碑志进行了清理，出版了大型考古报告《北宋皇陵》，为深入研究北宋陵寝制度提供了准确全面的资料。此次购入的 94 种北宋皇室碑志基本涵盖了该书所记载的新出土碑志的绝大部分，包括著名的兖王赵俊墓志、燕王赵颢墓志等。对宋史特别是宋皇室研究无疑是一批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峡水库的修建，使库区许多石刻淹没，我馆曾与有关文物部门联系，试图收集库区碑刻拓片特别是将被淹没的白鹤梁石鱼等水文题刻，虽然结果不理想，但却收集到沿江巫山地区清代、民国墓碑 82 种。这批墓碑的形制带有非常显著的地方特点，与中原地区碑刻有较大差异，可为了解当地的丧葬文化提供参考。

北京地区金石也是我们关注收藏的重点，多年来我们积极收集，已得到北京近郊及房山、通县、平谷远郊历代碑刻拓片 190 余种，不少是近 10 余年内新发现的，多数未见《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记载。

在收藏的拓片中，不乏解放前后新出的重要碑刻和石刻精品。如著名的《西汉北陞石题字》、《新莽东海琅琊二郡界域刻石》（二种）、《东汉买田约束石券碑》、《东汉肥致碑》、《东汉渡君碑》、《北魏司马悦墓志》、《北魏法义卅人等造像碑》、《北魏阎村邑子七十二人等造像碑》、《北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摩崖》、《北齐张噉鬼卅人等造像碑》、《张噉鬼张伏恭一百人造像》、《北齐华严经碑》、《唐郭虚己墓志并盖》（颜真卿撰并书）、《严仁墓志》（张旭书）、《徐浚墓志》（徐浩撰，徐璠书）等等。既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也有很高的艺术、书法价值，可谓弥足珍贵。

在大力搜访汉文字碑刻的同时，我们也有意识的搜集少数民族古文字碑刻。近年我们收集到元代八思巴碑拓 3 种，这使北大图书馆所藏八思巴碑刻达到 66 种，八思巴碑拓收藏品种之多，居国内外第一。

第二，法帖方面的收集

近几年丛帖的批量增加也是我馆拓片收集工作最大收获之一。

丛帖是保存古代名人诗书手札、反映其社会活动以及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文献，具有碑刻不能替代的特殊价值。因历史渊源之故，丛帖收藏一直是北大图书馆弱项，与其藏拓规模及地位极不相称，亟需补充。目前丛帖存世越来越少，收集难度大，价格也较高，但如不抓紧，以后收集将更加困难，为此我馆下大力收集。

近年共收得丛帖 90 余种，使北大图书馆丛帖收藏数量翻了一番，占到传世 400 余种丛帖中不小的比例。新入藏中较著名的有：宋刻《汝帖》十二卷、宋款《星凤楼帖》十二卷（旧拓）；明刻《戏鸿堂法书》十六卷（明拓）、《郁冈斋墨妙》十卷（明拓）、《东书堂帖》十卷（明拓）、《余清斋帖》八卷、《清鉴堂帖》十卷、《二王帖》、《晴山堂帖》十卷、《书种堂帖》六卷、《海宁陈氏藏真帖》八卷；清刻《琅华馆帖》二卷（初拓）、《英光堂帖》二卷（初拓）、《清霞馆梁帖》六卷（初拓）、

《天瓶斋法书》十卷（初拓）、《太原段帖》四卷（旧拓）、《快雪堂法帖》五卷、《明人国朝尺牍》八卷、《安素轩石刻》十卷、《倦舫斋法帖》八卷、《穰梨馆历代名人法书》八卷、《澹虑堂墨刻》八卷、《寄畅园法帖》六卷、《清啸阁藏帖》六卷、《平远山房帖》四卷、《湖海阁藏帖》八卷、《望云楼集帖》十二卷、《松雪斋法书墨刻》六卷、《橘隐园赵帖》四卷、《寒香馆藏真帖》六卷、《诒晋斋书》四卷等等。多系旧拓，名帖荟萃的同时，也有容庚编《丛帖目》未载的稀少品种，可谓不易。

第三，砖刻方面的收集

安徽亳州市南部有大面积的东汉曹操宗族墓葬群。1974年以来文物部门挖掘清理了其中七座墓葬，发现了大量刻划有文字的墓室砖。砖文书体为隶书、草隶，还有少量行书，多系工匠在湿砖坯上信手划写。这批砖文内容广泛，包含工匠记名、标记、记事、记年、记曹氏宗族及其他官吏姓名和哀悼之辞，其内容对了解曹氏家族的家世和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都有较高的价值。从汉字书体演变、民间书法角度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997年我馆收集到曹氏宗族墓室砖拓片208种，可以说是较珍贵的。

五. 结语

对我们多年努力而言，以上所获成果是最好的回报。我馆网上目录披露后，新购拓片特别是墓志已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借阅。2002年10月北大图书馆百年馆庆之时，古籍部曾举办《本馆近年新购古籍拓片精品展》，展出的珍稀丛帖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留言希望能够予以出版。

金石文献是宝贵的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利用拓片将其内容尽可能多地留在人间，泽被当代，惠及后人，影响深远。面对世间金石越来越严峻的处境，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有所为而不为，既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后人。对此，我们图书馆人有责任担起重任。